

资 本 主 义 研 究 丛 书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Toward a socialist theory of democracy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英〕约翰·基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英〕 约翰·基恩 著

马 音 刘利圭 丁耀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John Keane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译出

·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著 者: [英] 约翰·基恩
译 者: 马 音 刘利圭 丁耀琳
责任编辑: 冯韵文
封面设计: 孙元明
责任校对: 昆 鹏
责任印制: 窦建中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1.125
字 数: 279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2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1—9600

ISBN 7-80050-326-7/D·74

定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英) 约翰·基恩著; 刘利圭等译.
2 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2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80050-326-7

I. 公… II. ①约… ②刘… III.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
生活-研究 IV. 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0940 号

2050/23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自15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学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发育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为期约300年，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期约150年，即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性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期约50年，即从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界定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母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十分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基本种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②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③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结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

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是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作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

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绪 论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由于教条主义地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必定要同时并进，所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在过去的40年里已经大大地暗淡了。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是这种教条最有影响的版本，这种版本被用来为各种新式的官僚主义统治辩护，同时妨碍各种民主自治理论的更新。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保卫民主其实就是为赢得对官僚主义国家机构的控制而斗争；利用这些机构在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指挥能力；从而减少或取消私人资本的权力及其应负责任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倾向无疑把国家和资本主义机构的“消亡”看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然而，政治权力暂时还被认为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社会主义成就，为了保护这些成就和未来的变革，防止“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破坏和报复行动，国家权力还是需要的。在反对这些抗拒分子时，官僚主义的国家会变成存在之物的临时保管人。国家通过保证投资、减少失业和扩大社会保险项目的再分配战略使自己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便能保证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公正和平等。于是，一个民主的“人际关系”、不受限制的生产和大量福利事业的时代便开始了。

这种预测认为，一种比较“民主的”秩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结果。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性质不仅在于它的反资本主义的再分配政策。由于负责实现民主的“均衡模式”（麦克弗森语），即接受传统的选择机制和有权威的政府——这些机制如保证

政党精英之间的竞争的定期选举、法治和立法机构独立等，国家便可以强化以民主名义实行的财产关系社会化。社会民主主义深信这些机制的必要性，进一步设想社会群体不会独立自主地作出政治判断；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扮演被动的公民角色，宁愿选择政治上的精英人物，后者则依靠争取选票获得决定权。这种**统制主义**的均衡民主模式被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解放模式；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过分自信的观点，通过逐步扩大官僚主义国家权力的网络就可以分期建成合作的和民主的社会。

在这种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关系的假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主本身的概念被断章取义的程度。很不严格地说，如果我们所说的民主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和多元的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与整个集体有利害关系的各种决定都是由集体所有成员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那么，从某种规范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使这个概念的含义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和倒退的）变化。通过某种含糊不清的解释，民主变成了统治者向被统治者传达决定的同义词。从前被公认是限制滥用职权的主要手段的民主，现在却变成了无自由权状态的伙伴，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变成了在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现存的官僚主义化的同义词。

这里以一种简略方式描述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假设。然而，关于这些假设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却不能有丝毫怀疑。从它自己的政党组织圈子到它已经占领和扩大的国家机构，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大大地加快了当代生活的官僚主义化。它促成了日常生活的进一步分化，给个人和群体贴上了标签并加以限制，通过官僚主义的专业技巧强化了调节和安排生活的一整套制度。然而，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没有它的困难和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

正在很快地不再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可行的和合理的政治选择。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领域里的生产减退和变化以及关于国家官僚政治的争论所带来的压力下，社会民主主义保证通过行政手段达到一个民主的“人际关系”时代的目标比它的鼓吹者迄今所设想的更难达到，这一点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

这至少是本书收集的这几篇论文的出发点。这些论文以突出批判社会民主主义促进官僚主义化倾向的形式出现，确信晚期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革，关键在于通过建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来削弱公司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力。根据这些论文的观点，只要两个以上原先单独行动的个人聚集在一起探讨他们自己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已经和始终置身其中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关系，一个公共领域便形成了。通过这种独立自主的结合，公共领域的成员们考虑他们要做什么，确定他们将如何在一起生活，推定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手段的估计限度内如何才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集体行动。从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天永远取消这种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就会像中世纪的农民失去公共土地那样引起严重的后果。支持这种信念的论据大部分来自20世纪德国政治思想的传统，尤其是马克斯·韦伯、于尔根·哈贝马斯和克劳斯·奥费的著作，而这些论据又被三个互相联系的论点联系在一起。本书非常扼要地概括了这些论点。把这些论点放在一起考虑，可以被看成是对更新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贡献，更确切地说，可以被看作重新考虑和说明以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的初步尝试。

按照本书所介绍的第一个论点，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都生活在全是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延伸的阴影下。在晚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尤其是在它的北大西洋中心地带，例如美国、联

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官僚主义的合理性倾向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些国家里，对人的管理会让位于对物的管理这个19世纪的希望正在得到实现，尽管是以一种完全颠倒了和伪劣的形式。不仅是物，而且连人本身也都在受到形式繁多的官僚主义机构的管理和控制。这种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不仅限于工厂里劳资关系的变化。正像马克斯·韦伯首先令人信服地论证的，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正因为它是不完善的，所以在生产这一点上是会引起误解的；资本控制工资劳动者只是更广泛的和高度复杂的官僚主义化过程的一个实例。这一点的反证是，官僚主义的权力关系不仅限于国家行政管理领域，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机构已经到了越来越取决于它的运转方式的地步。克里斯蒂安·克劳斯、约翰·格雷斯和J.S. 穆勒等人首先提出的官僚主义就是由政府官员来管理的各种依据，现在都必须加以修改；官僚主义这个词再也不能被用来仅仅说明国家决策和管理过程的特点了。

诚然，要用这第一个论点的措词来表达，就要冒小看晚期资本主义政权和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的区别的风险，反而强调它们的连续性。这些论文并不打算犯这种错误，因为它们强调，渗入和组织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强有力的官僚主义组织网络，并不完全忘掉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区别——这是严格区别晚期资本主义秩序和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特征。在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下，国家官僚机构力求规定、抚慰、有时则威胁从家庭到工厂、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手段由一个按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官僚主义机构——受政党监督和支配的国家——所垄断，它的目的是要使除它以外的权力中心不可能发展起来。由主张政党形式的统治权而合法化的政治官僚主义具有一种全球性的、即使是充满危机的特点：它统治整个社会，

前提是使公共行动领域消失和受到限制。^①

相反的，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消除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区别还没有成为现实；例如，由于资本家和国家官僚机构之间的一贯对立，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趋向于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社会机构和国家机构正在变得越来越互相依存。正像希法亭等人早就指出过的，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不是由“天生”自由的个人和遏止国家权力的官僚主义集体主义的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构成的。官僚主义的支配和服从关系盛行于当代生活的一切领域——从入狱、交往和卫生到生产、教育、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在这个论点的引导下，本书这些论文把注意力引向大多数现代先进的工厂和办公室如何变得像学校、医院和监狱一样，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如何力求规定、监督和控制生活、健康和死亡。据观察，在大众传播领域里，电台、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新闻机构的领导人都在谋求严格规定供他们的公众消化的文化的类型和数量。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官僚主义机构的监督和纪律甚至可以把影响扩大到最隐秘的家庭生活领域。

因此，正确的理解是，官僚主义化的过程正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在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公私领域里进行。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威胁和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

①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下建立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比起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来，是一个更加危险的计划。这一点在乔治·康拉德的告诫中有生动的表述：“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享有自由。找别人谈话，不加掩饰，把秘密公开。你被秘密社团的领袖、部门的头头和副手所包围。最低级的官员为他的秘密感到自豪，甚至幼儿园里的小孩也学会留神他们说的话。在我们的地区里，革命者就是避开秘密的人。所以要把秘密公开，要朴实，要理解你的朋友最朴实的方面。……无论你是否自由，都会在下一分钟里作出决定。你可以在一个街角等公共汽车，在你的房间里等一个电话，在床上等一个梦”（《来自布达佩斯的信》，载于1981年11月5日《纽约书评》第49页）。

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其结果是，各种官僚机构正在使自己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圈子，看来谁也不允许离开这个圈子。

这个包围的过程当然取决于官僚主义机构保证合法地管理它们的成员和委托人的倾向。本书这些论文的第二个论点是官僚主义希望管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居民。据认为，所有官僚主义机构都倾向于对特权、任务和责任作出差别很大的安排，其基本组织原则之一是非政治化。这个论点完全不考虑自由主义理论的悠久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假定官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对立关系只是由国家官员倾向于废除均衡民主的目的和方法而产生的。这种假设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官僚机构现在是靠受控制和盲目服从的国民兴旺起来的，他们承认官僚主义的支配和服从关系的正常性和必要性。公私官僚机构寄希望于它们逐步造成的非政治化，当然力求把它们根子深深地扎进一切社会和政治关系中去。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机构逐步变成日常工作机构。日常生活受到等级制机构网络的普遍影响，这些机构都由领导人、专业人员和专家顾问来管理，每一个机构都雇用法律顾问、保安人员和宣传人员，每一个机构都力图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居民变成争取达到这个机构的目标的可靠工具。根据这第二个论点，这就意味着，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官僚谋求在没有自下而上的讨论和监督的情况下作出各种决定。有关机构的形式及其目标问题，倾向于通过命令主义的和形式上是合理的手段来决定。无论什么地方官僚主义机构都不仅依靠对声望和权威的崇拜——这是一切寡头统治的一个特点，官僚统治是寡头统治的一种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依靠对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专业化管理，使这些领域成为可以进行技术控制的非政治化对象的愿望。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从理论上为这种官僚主义从属关系的过
程所进行的辩护，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已经尽人皆知。同时，可以

认为，为非政治化所进行的这些辩护已经产生了类似“形而上学的夸张”（古尔德纳语）的东西，这就是说，加强了无法逃避官僚主义命令的宿命论思想。本书的这些论文批判地讨论了这种夸张的许多例子：民主的“均衡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提出的安全状态；公共生活概念的“重新封建化”；官方对“管理”居民的关心；传统的政治概念和早期自由主义合法权力理论的退化；最后是各种形式的科学技术论述的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非政治化“思想体系”大部分来自马克斯·韦伯，他对官僚主义的透彻分析在这里（论文二、四、七）被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理论的严重妨碍。当然，把韦伯的观点包括在围绕着官僚主义统治的形而上学夸张之内，乍看起来似乎是苛刻的和令人误解的，因为他是打算驳斥无条件地盲目崇拜官僚主义的。他坚持认为，并非所有的活动和事情都能通过官僚主义的办法来规定和控制；抽象的和精打细算的官僚主义机构压制各种特殊的需要和活动，并且有步骤地引起政治目的感的丧失。不过，这些机构在技术上的优势保证了它们的不断扩张，这是韦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是不可缺少的进步。他断定，在当代的条件下，放弃争取民主的公共生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被动的民主化”才是可能的。

根据本书这些论文的观点，这个结论是很不令人信服的。韦伯为官僚主义的必要性所作的辩护有几个致命的弱点。这里可以简单地提一下其中的两个，因为这两个弱点合起来不能不导致这样的结论：韦伯显然不能证明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不可能抵制官僚主义统治的“预期进展”。首先，他过高地估计了官僚主义机构在技术上和行政管理上的熟练程度；他因此而没有充分如实地陈述这些机构破坏它们自己要求有效地和按照专业的、表面上合理的规则履行职责的一贯倾向。第二个弱点与第一个不足之处联系在一起：韦伯没有分析官僚机构规定、管理一切现实并使之非政

治化的愿望如何有步骤地妨碍维护其下属机构的纪律。韦伯还毫不犹豫地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政治都必然是一种副业；他因此而严重地低估了官僚机构可能催化保卫独立自主民主讨论原则的权力斗争的程度。

对韦伯的这些指责是指导本书这些论文的第三个论点的前提。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行政机关这部“没有生命的机器”不断地引起对独立自主的公共行动的要求。在当代，民主的公众自由到处都被国家和大公司的官僚机构所控制，这当然是事实；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落入官僚主义奴役怀抱中的全体居民被要求心甘情愿地崇拜或暗地里诅咒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行政管理、传播媒介和战争的人。不过，同样明显的是，在国家和大公司的官僚机构内部或相互之间不可能协调一致；这些机构的霸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奏效，而是依靠在行政管理上不断地玩弄花招和重新适应各种独立自主的反抗。从这一点来看，对普遍地轻视公共生活表示惋惜往往是为时过早和夸张，因为任何地方的官僚主义行政机构都倾向于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正像卢卡奇在反对韦伯时首先坚持认为的那样），而且成为在办公室和工厂以外的各种斗争的对象。这些斗争影响了官僚主义机构内部的不断调整，而且增加了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得到发展的条件。这些反抗直接与社会民主主义所提倡的统制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相矛盾。可以说，这些反抗在反对这种模式时也有晚期资本主义秩序所不能痛快地满足的新的需要和期望：对社会和国家范围内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

本书这些论文在为这第三个论点——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机的影响——辩护时举出了两个密切相关的理由。首先，某些薄弱环节、计划失误和其他不均衡状态都是由于公私机构不能用官僚主义的办法协调彼此的关系所引起的。正像奥费特和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见论文三），在和

其他官僚机构一起行动或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断压力下，官僚主义的精英人物通常不得不放弃他们自己原则上拒绝在非正式基础上办事的做法。这些精英人物想通过非个人的和技术上成熟的运转规则治理他们的环境的愿望，与尽力乞求其他官僚机构和反对派运动的合作——例如通过阶级合作性质的决策办法和非正式的讨价还价——是矛盾的。其次，这种对官僚主义试图保证使全体居民非政治化的打算的横向限制，由于官僚主义机构内部的类似困难而倾向于加强。这些机构试图悄悄地履行它们的职责而“不考虑特殊的人和环境”（韦伯语），与它们有邀请其本身的成员参与的义务是矛盾的。这种邀请过程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机构”不论什么时候都至少要依靠其成员的最低限度主动性。更重要的是，官僚机构的非个性化运转方式不断地使其成员疏远并引起他们的积极反抗。官僚主义机构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这些自相矛盾的动态经常打断它们变成日常工作机构的趋势。官僚主义的权力关系应该被理解为始终是脆弱的中介以及为信用和权力分配而斗争的结果。按一种自相矛盾的组织原则——非政治化——建立起来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地被迫邀请其成员和委托人积极参与，同时又压制他们的主动性和独立自主性。公共领域——集合在一起的国民在其中发表意见、相互影响和独立自主地决定行动的方针——是各种官僚主义权力范围内不间断的、虽然不是故意的虚假相互承认过程的产物。国家和大公司机构必然不断地促使它们的成员和委托人变成仅仅是行政管理对象。它们往往还由于假装接受通过争论、公开讨论、妥协和取得一致意见的办法调解利害冲突的原则，激发起对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的需求。大公司和国家的各种官僚主义机构内部和相互之间所遇到的麻烦的基本根源是，它们必须保证得到其成员和委托人坚定不移和不间断的支持——同时又不引起他们坚定不移和不间断的干预。

在本书这些论文中分析了这种纪律和参与的辩证法的各种实